

# 近代陕西著述概况及其特征\*

梁严冰 刘 蓉

**提 要:** 近代陕西著述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地方志编撰; 洋务运动开始后, 旧学尤其是以科举为内容的著述衰落, 新学及反映现代新学科的著述开始兴盛。近代陕西著述所反映的内容或事件本身发生在陕西, 但著述的影响却具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西北联大时期, 西北联大学人著述出版了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论著; 陕甘宁边区出版、翻译了大量马恩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及毛泽东思想论著, 这些著作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意义重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近代陕西 陕甘宁边区 著述出版

著述是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学术、文化最直接的反映, 也是该地区一定时期内政治、经济、技术、社会风气等的风向标。近代陕西百余年间的著述, 可以说既是全国这一时期著述情况的一个缩影, 又呈现出陕西著述自身的鲜明特征。其间以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为一个大致节点, 此前可视为传统著述的延续, 此后则是陕西著述新模式的开启。教育文化中心的变迁促成了著述出版发行中心的变迁, 政治体制的变化又促成了著述主体的变化, 技术的更新则改变了著述的印刷、装订、发行形式, 而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与变化促成了著述内容的全面刷新。本文意在较为全面、客观呈现近代陕西著述的概貌, 彰显近代陕西著述的独特魅力和鲜明特征。

## 一 近代陕西著述出版发行中心的变迁

中国古代书院产生于唐代, 源自民间和官府, 是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 其主要功能是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 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sup>①</sup> 1840 年以来, 遍布陕西各府州县的书院承担着陕西文化教育功能, 其中尤以明清以来享有盛誉的关中四大书院为文化教育中心。位于西安的关中书院、三原的宏道书院、泾阳的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等, 荟萃众儒群贤、士绅英俊、志士仁人, 在近代陕西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12 年以前的陕西著述就主要产生于这些书院。这些书院既刊刻全国各地流行通用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 书院先生、弟子的各类著述; 也刊刻许多官修方志, 如康熙、雍正两修的两种《陕西通志》, 就是西安官刻志书。<sup>②</sup> 四大书院之外, 陕西各地尚有许多知名书院, 如郿县的横渠书院、醴泉的烟霞书院、朝邑的华原书院、商县的商山书院、泾阳的正谊书院、绥德的雕山书院、渭南的景贤书院、延安的嘉岭书院、三原的学古书院、榆林的榆阳书院、汉中的汉南书院、盩厔的对峰书院、郿县的明道书院、西安的鲁斋书院等。可以与书院出版发行各类著述相提并论的, 是官绅士子的私刻, 著名的如三原刘氏的传经堂、李氏桐阴轩、泾阳的经正堂、安康的来鹿堂等。中华民国建立后, 陕西著述出版的中心发生变化, 其中一显著特点是由

\*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 “陕西省志·著述志(1840—1949)” (项目编号: 13W002)、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 17JZ050)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 东方出版中心, 2004 年, 第 10 页。

② 参见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主编: 《陕西通史·明清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第 498 页。

乡间转向城市，并形成近代陕西两大出版中心，即西安和延安。西安自古帝王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先后有周、秦、汉、隋、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长期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存在。辛亥革命后，陕西成为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北方省份。民国17年（1928）11月25日，陕西省政府议决设立西安市。<sup>①</sup>之后，西安的城市建制、行政区划虽有变化，但依然是陕西乃至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著述出版非常丰富。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延安既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又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模范根据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出版发行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出版发行的报纸有近百种，并有大量的马列著作和书籍出版。<sup>②</sup>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成为中国新文化中心。要特别强调的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紧密围绕抗日救亡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主题，对社会思潮进行有效引领，出版的大量论著，对形成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话语体系、创立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意义重大，从而使延安成为中国新文化中心和重要的出版地，颇受世人瞩目。

## 二 近代陕西著述出版主体的变迁

近代陕西著述出版的另一特点是，著述出版的主体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著述出版主体由传统的以民间、个人出版为主转向由政府及其各部门、政党团体、社团、研究会、出版社等出版为主。

中国古代著述出版主要有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类，就陕西地方而言，除了各府州县署的官刻和各地书院刻书之外，则主要是私刻、坊刻为主。私家刻书如三原刘氏传经堂、刘氏述荆堂，泾阳柏经正堂、合阳书堂，西安李氏代耕堂等，无不在当时享有盛誉，是传统学术文化著述出版的重要来源，举凡四书五经、忠义贤达、劝世箴言、乡贤著述，尽皆刊刻。其中合阳书堂的合刊的《长安志》和《长安图志》等，都是刻印的陕西图书佳品。<sup>③</sup>晚清至中华民国建立，政权鼎革，社会变迁，政治体制等的变化促成了著述主体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由以往传统的乡间士绅、民间个人出版转向政府、政府部门、政党团体等为主。如，晚清陕西藩署在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第一时间即进行了翻刻发行。中华民国建立后，陕西省政府教育厅等部门团体刊印了大量关于教育的政策、法令、法规及指导性论著。如，陕西教育厅编、艺林印书社民国16年（1927）刊《陕西教育法令丛刊》，陕西省教育厅编、西安市政府印刷局民国19年铅印《陕西省教育法令汇编》，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编辑、陕西省政府印刷局民国17年刊《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法规汇刊》，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编、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民国18年刊《陕西省民众教育委员会会务一览》，周伯敏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26年铅印本《救国教育》，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1年编印《陕西教育概况》，洪宝林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2年铅印《怎样训练特殊儿童》，尹耕南编、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2年铅印《怎样推进地方合作事业》，陆廷珏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2年铅印《中心国民学校办理社会教育纲要》，胡超伦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2年铅印本《国民教育视察与辅导》，沈宝铭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办理成人班和妇女班》，熊翥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筹集中心

① 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行政建置志》，总第2卷，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

② 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梁星亮、姚文琦主编：《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41—744页。

③ 参见郭琦、史念海、张岂之主编：《陕西通史·明清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99页。

国民学校基金》，金蕃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管理地方教育经费》，水心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解决复式教学的困难》，辛楷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经营学校校园和农场》，顾开轩编著、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国民教育辅导研究会主编、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考察成绩和记分》，水心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搜集并编辑地方性教材》，董德鉴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推进地方文化事业》，桂丹华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推进各种社会运动》，顾开轩编著、陕西省教育厅33年铅印《怎样指导中心学校毕业生升学》，刘开达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做一个中心国民学校的校长》，黄竞自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怎样做一个中心学校的教导主任》，万启宇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中心国民学校怎样办理幼稚教育》，方洪浦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中心国民学校怎样协助地方自治》，金钺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3年铅印《中心学校怎样辅导国民学校》，魏冰心编著、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5年铅印《怎样实施国语常识科混合教学》，张耀斗编辑、陕西省教育厅民国36年铅印本《国民教育》，等等。这些由陕西省教育厅等部门刊印的关于教育的政策、法令、法规及指导性论著，不仅记录和反映了时代的步伐和节奏，而且对陕西近代教育的普及、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陕西省其他政府部门及机关也刊印了大量相关报告、会议记录、统计报告等，如陕西省临时参议会秘书处编、陕西省临时参议会秘书处刊《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大会记录》（含各年），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刊《陕西省年度行政会议专辑》（含各年），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汇编、陕西省政府秘书处刊《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含各年），以及陕西省民政厅民国32年（1943）编印《陕西省实施新县制促进地方自治之检讨》，陕西省民政厅民国31年编印《陕西省新县制巡回督导团财政报告书》之一、之二，陕西省政府统计室编、陕西省政府统计室刊《陕西省统计资料会刊》，陕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股汇编、陕西省政府秘书处刊《陕西省政府施政成绩报告》（含各年），陕西省建设厅民国27年油印《陕西省建设厅单行法规汇集》，陕西省建设厅民国30年油印《陕西省建设厅单行法规四十六种》，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编、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民国刊《陕西省现行法规汇编》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编、陕西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民国32年刊《陕西省现行法规汇编（附编）》，陕西省银行编《陕西省银行概况》《陕西省银行工作报告》《陕西省银行志》《陕西省银行汇刊》《陕西省银行业务报告书》，等等。这些书籍的刊刻既保留了大量相关原始资料，又为陕西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了依据与保障，并反映了近代陕西著述出版主体的时代变迁。

### 三 近代陕西地方志著述成果丰硕、特色鲜明

近代陕西著述成果最丰硕的，当属地方志的编撰。地方志，也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即“一方之全书”。它的特点是“兼县史地，注重人文，详今略古，纪实求真”。中国历朝历代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此项工作，方志编撰在积累资料、保存文献、总结经验、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意义非同小可。从乾隆时期全国性的大规模修志以来，方志编修已成为中国著述的一大亮点和特色。道光以来，方志的修纂仍然兴盛不衰，首先表现在地方官绅对于本地前修志书的重新修订刊行。如嘉庆《延安府志》在光绪十年（1884）进行了补

刻,嘉靖本《澄城县志》和清顺治本《澄城县志》等志在咸丰元年(1851)进行了重刻。另外,除了道光、咸丰、同治时期的各地修志外,光绪时期还进行过全国性大规模修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乡土志的修纂。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学部在办新学的同时,通令各地编纂乡土志,作为专供初等小学堂一二年级启蒙教育所用之乡土教材,并颁布了《乡土志例目》,指导各地就历史、地理、格致三方面材料编写,要求务为简明。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又敕命各县从速编纂,地方政府奉令邀集当地有关人员编写,因此大部分乡土志约编成于1906年前后,此前及民国时虽亦有乡土志编成,但较为零星。中华民国建立后,延续以前修志传统,在全国推行编修地方志,与旧志相比,民国新志大都增加了地质志、工商志、交通志、社会志、自治保甲志、财政志、军警志、司法志、党团志、卫生志和方言谣谚志等新内容,反映了晚清民国社会的变迁,其中尤以黎锦熙编纂的陕北四志——《黄陵县志》《洛川县志》《同官县志》《宜川县志》最为著名。

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从西安迁至城固,联大教授黎锦熙到陕南城固后感慨颇深,决心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地方志的纂修至关重要。之后,他受县长余正东之邀,被聘为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总纂,受命草拟续修工作方案,为城固县续修方志,方案由他手定,并总其成。1940年,黎锦熙开始研究中国旧方志学理论,根据当时社会实际状况,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并对新修方志的目标、功能、原则、方法、篇目等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sup>①</sup>在这一过程中,黎锦熙不拘泥于旧志体例,吸取各家之长,抛弃糟粕,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要求出发,革新方志的体例和内容。他在城固6年间,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0余篇,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著作《方志今议》(又名《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对中国现代方志学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成为新修地方志的理论指导书。该书论述了方志的四原则和取材的“三宗”,四原则是指“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三宗”是指方志材料来源于实际调查、档案整理、群书采录。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一整套理论体系。在这部书里,他还根据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修地方志的理论,结合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体会,论述了新修方志的基本取向和创新。主张“以后方志,决不当再以文章体裁分类”,而是“某类用何文体,一随其事之宜”。<sup>②</sup>在《方志今议》中,黎锦熙创设了城固“县志拟目”,拟目分为5门30篇,附录二种。具体志目为疆域总图、大事年表、建置沿革志、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地形志、农矿志、土壤志、生物志、人口志、工商志、交通志、财政志、水利志、合作志、吏治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司法志、卫生志、党务志、教育志、古迹古物志、宗教祠祀志、氏族志、人物志、风俗志、艺文志、方言风谣志,后附本县文征和本县丛录等。该著作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高度赞扬,朱士嘉撰文称:“从表面看,《方志今议》是专为编写《城固县志》而作的,但它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部分经验,已经概括上升为理论,而这种理论既精湛,又有说服力,对于我们编修社会主义省志、市志和县志,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sup>③</sup>之后,他于1942年开始陆续撰成《黄陵县志》21卷、《洛川县志》27卷、《同官县志》32卷、《宜川县志》27卷,并相继出版,为陕西地方志的建设和发展中国方志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黎锦熙主持撰写的陕西地方志新志书以“地志历史化,历史地志化”为修纂标准,

① 参见秦开凤、何炳武:《黎锦熙的方志理论与实践》,《西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② 黎锦熙、甘鹏云:《方志学两种》,岳麓书社,1984年,第24页。

③ 朱士嘉编著:《中国方志名家论选》,湖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2页。

目的要使地方志起到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和旅行指导4个作用,《方志今议》从而也成为全国新修地方志的理论指导书,时至今日对全国新修地方志书仍有现实参考意义。

#### 四 近代陕西著述所关涉的内容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

近代陕西虽然不像古代陕西一样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但在全国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单元,并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点。如,同治年间回民事变对陕西影响至深至巨,一大批相关著作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这一事件,如王道源《关陇思危录》、易孔昭《平定关陇纪略》、杨毓秀《平回志》、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陈邦瑞《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马祥麟《陕甘劫余录》、张修府辑张芾《张文毅公奏稿》、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疏续编》等,以奏疏、军书等一手资料以及作者们的亲历亲见亲闻,描述同治陕甘回民事变的起因、经过、相关攻守事宜。

晚清及民国初期,西北开发备受国人关注与重视,嘉、道、咸时期学者们潜心于西北史地研究,孙中山设想在西北修筑铁路、开发西北富源,盘踞西北的各路军阀也提出了一些建设西北的政策和主张。但20世纪30年代以前,国人对西北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学术热情或政治理想,各种建设主张大都未能付诸实施。这种情况,从30年代开始有了明显变化,西北的重要性引起了政府及朝野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1930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专门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sup>①</sup>;1934年5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视察陕、甘、宁、青四省,指出“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并强调“西北建设,是我中华民国的生命线”<sup>②</sup>;1938年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发表谈话指出,战前我国经济建设分布失调,发展畸形,今后应注意内地建设,并以“西南、西北为基础”<sup>③</sup>。1942年,蒋介石亲赴西北各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视察,返回重庆后,于9月22日就西北建设问题发表讲话称,“这次视察西北之后,格外觉得不仅我们抗战可以胜利,而且建国也有把握。……如果我们说西南各省是我们现在抗战的根据地,那么,西北各省就是我们将来建国最重要的基础”<sup>④</sup>。随后,在11月24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积极建设西北增强抗战力量奠定建国基础案》。至此,抗战前后开发大西北成为当时国民政府及有识之士的共识。1932年组成的陕西实业考察团以及后来的各种西北考察团,还有各界人士,他们或公干、或考察、或游历,亲历三秦大地,对西北有了较为直接的认知。因此,事涉西北开发的各类考察记、游记类历史著述蔚为大观,如陈赓雅《西北视察记》、林鹏侠《西北行》、刘文海《西行见闻记》、陈万里《西行日记》、李孤帆《西行杂记》等,都记录了包括陕西在内的西北地区文化教育、风物民俗、农田水利、交通古迹、商业状况、民众生活等各个方面,为国人了解西北、陕西打开了一扇窗口。此外,徐旭著《西北建设

<sup>①</sup> 《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民国21年3月5日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sup>②</sup> 《宋子文在兰州畅谈西北建设》,《申报》1934年5月9日,第5版。

<sup>③</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酝酿制定“西南、西北及江南三区轻工业开发计划”史料两件》,《民国档案》2000年第2期。

<sup>④</sup> 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4年,第317—319页。

论》，陈岱孙等执笔的《西北经济建设论》，安汉著《西北垦殖论》，安汉，李自发编著《西北农业考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西北生产现状及改进办法》，陕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西京市工业调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编《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工作报告》，殷之谦著《中国合作之研究》，李仪祉等执笔《抗战与农产》，何庆云著《陕西实业考察记》等著述，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而且在西北开发的理论与实践中也具有重要价值。

1936年的西安事变震惊中外，记录、反映这一事件的著述在当时即成为热点。蒋介石、宋美龄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蒋介石随从李基鸿《西安事变纪事诗》都是当事人的记述，后来许多蒋介石的传记类著作中，西安事变也是重中之重。刘百川《蒋委员长西安蒙难杂记》、蒋万里《蒋委员长西安蒙难真相》以及《举世申讨张逆檄电集》《关于西安事变之报告与舆论》《西安事变后之舆论》《辟所谓“容共以抗敌”之谬说》《西安事变史料》《西安事变真相》等则是当时关于这一事件的诸多史料、舆论、评议和态度，这些著述成为以后研究西安事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一批外国记者以及中国的文艺工作者通过走访、观察创作的游记、通讯和报告文学等，及时对陕西、对延安进行自己的观察和评述，并向世界介绍了陕西。国人著述如《陕北纪行》《陕北印象》《西北特区特写》《延安访问记》《漫走解放区》等，对陕北的各方面进行了描述。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随军漫记》《中国之战歌》，鲁登·爱泼斯坦的《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北散记》《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根室·斯坦因《延安的日本俘虏》，英国乔治·何克的《我看到了新中国》，瑞士巴斯哈特的《延安视察记》等，都以独特的视角对陕西、对延安进行了自己的观察和描述，并真实地向外界介绍了陕甘宁边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 五 传统学术著述逐渐衰落，新学及现代学术著述兴起

从洋务运动到学制改革再到民国新学逐渐普及，旧学尤其是以科举为内容的著述衰落，新学及反映现代新学科的著述开始兴盛。从总体而言，1840年至科举废除前，学术主流仍沿袭明清以来传统，以儒家经典研读为主要内容，因此围绕四书五经的阐释、注解、研究类著作较多，其中又尤以关学传承特色鲜明。自宋代横渠先生开创关学以来，宋代吕大钧、吕大临，明代吕柟、冯从吾等博学鸿儒都致力弘扬，正如二曲先生李颀所称“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sup>①</sup>。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主张学贵有用、道济天下。正因如此，易学研习蔚成风气，唐宋以来的易学著作，如唐人陆德明的《易经释文》《易经初学读本》，宋代朱熹的《易学启蒙》《周易本义》《周易读本》，明人洪守美《易说醒》及清人傅恒《御纂周易述义》等在陕西仍多有刊行。张载、程朱、吕氏的著述极为流行，如张载的《张子全书》，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经读本》《四书读本》《四书章句集注》，程颐、程颢的《二程全书》《二程粹言》《二程遗书》《河南程氏外书》《伊川易传》《伊川经说》《程子经说等》，吕大钧兄弟的《吕氏乡约》、吕柟的《吕泾野先生经说》《泾野子内篇》等，均版本众多，广为流传。冯从吾的《关学编》是一部详实的关学史，与冯从吾并称关中三先生的朝邑王建常《大学直解》、盩厔李颀《四

<sup>①</sup> 李颀：《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181页。

书反身录》等都屡被翻印。先贤著述的重刊之外，时人著作也不时涌现，成为洋务运动以来陕西实学、新学兴起的基础。三原贺瑞麟崇朱子理学，咸阳刘古愚重今文经学，其著述《清麓答问》《学记臆解》《孝经本义》等皆代表一时风气。随着晚清的动荡与变革，陕西传统儒开始走向衰落，新学逐渐兴起。做过冯玉祥、宋哲元军事顾问的张文穆，1930年夏曾在陕西省读书会有过一个讲演，书名《大学之系统的研究》，虽仍是讨论四书之一的《大学》，但仅从书名上看，已经与旧学大为不同。三原陈顾远《孟子政治哲学》《墨子政治哲学》，则已经完全是新的学术面貌。总之，随着政治社会的变迁、西学的传入，现代学术、学科的建立，与之相应的著述大量涌现，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既著述出版了大量现代学术著作，又翻译了一些西方名著。法理学著述如，陈顾远著《保险法概论》《国际私法本论》《国际私法商事编》《国际私法要义》《中国法制史》《土地法》《五权宪法论》等，以及张恒忻著《民法要义》等；翻译出版的国外经济学著作，如张仲实译苏联柯斯明斯基著《封建主义》、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马凌甫译日本关一著《工业政策》（上下）、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论》（上下），施存统译日本山川均著《资本制度浅说》等。自然科学是“各学之门径”，翻刻的新学著作如梅文鼎的《平三角举要》、英人傅兰雅的《代数术》、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以及张秉枢的《火炮量算通法》是较早的弹道学专著，此外还有《九数通考全部》《微积溯源》《勾股细草》等。农业、水利、地质方面，如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著作《论引泾》《再论引泾》等是现代化水利工程建设典范之作，德国的芬茨尔博士在受聘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和陕西省政府期间的著述如《秦岭天然林之育护及沿黄沿渭滩地林之培植》《西北引渭治黄中林业将来之任务》《西北造林论》等，奠定了陕西林业发展的基础。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齐敬鑫博士的著作《民国二十四年陕西之林务》《国防用材核桃木》《陕西黄土高原天然情形之研究及其改进之可能》等都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著作出版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他农业方面的著作如陕西省农会编《陕西劝农浅说》，陕西棉产改进所编《陕西棉产估计调查报告》，熊伯衢、万建中编《陕西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华源实业调查团编《陕西长安县草滩、泾阳县永乐店农垦调查报告》，陕西棉产改进所编《陕西棉产改进所推行合作事业报告》等，都对陕西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陕西地质学界的奠基人之一、蓝田赵国宾的著作《陕西泾洛两河下游间地质矿产》《陕西梁山尾间地质矿产及启发龙门山煤矿与石灰之设计》《启发韩城龙门煤矿石灰之设计》等影响巨大，杨钟健是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著作《新疆之奇台天山龙》《许氏禄丰龙》等在古生物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等等。尽管这类著述不算很多，但已经呈现出崭新的学术文化面貌，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现代学术在陕西的建立和发展，并对以后陕西特色学科的形成在理论与实践上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 六 西北联大师生的著述具有重要影响

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组建的一所大学共同体。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16696号令，宣布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sup>①</sup>太原失守后，西安告急。1938年3月，西安临

<sup>①</sup> 参见《西北大学大事记》编委会编，赵弘毅、程玲华主编：《西北大学大事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大迁离西安，到陕南汉中等地办学，同年4月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组建后，1938年7月、1939年8月，国民政府先后指令西北联大分置为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及西北大学等5院校。抗战胜利后，西北联大主体大部分永留西北。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都与西北联大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西北联大的组建不仅赓续了民族的文化血脉、保证了弦歌不辍，而且承载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它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系统植入西北，是西北高等教育的摇篮。西北联大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独特贡献，而且联大学人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产生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与论著，成为当时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sup>①</sup> 相关著述、教材、讲义等如国立西北大学委员会编，1947年2月印《国立西北大学概况》；陆懋德著，1937—1939年成书《中国上古史》，该著作于1941年获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陆懋德著，撰成于1937—1939年间，出版于1945年的《史学方法大纲》；张知道著，1935年3月出版的《西京碑林》，是近代以来专以碑林为题材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物，对西安碑林的历史沿革和所藏历代碑刻作了概要介绍；冯承钧译著，193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多桑蒙古史》，是西北联大时期历史系学生必读书目之一，该书是19世纪初瑞典人多桑写的一部蒙古史，所叙时间为12世纪初至14世纪80年代；杨钟健著《新疆之奇台天山龙》，1937年列入《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2号，由地质调查所印行；杨钟健著《许氏禄丰龙》，1941年列入《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7号，由地质调查所印行；杨钟健著《巨型禄丰龙（新种）》，1947年列入《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12号，由地质调查所印行；杨兆钧著《维汉字典》，国立西北大学出版社1947年油印出版；黄文弼著《高昌陶集》，1934年出版；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出版；西北联大历史系自编讲义《中国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西北史地之研究》等；汪奠基著《现代逻辑》，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许兴凯著《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1929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许兴凯著《日本政治经济之研究》，1931年天津百城书店出版；周传儒著《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1932年上海开明书局印行；周传儒著《西北利亚开发史》，1935年正中书局印行；周传儒著《意大利现代史》，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蓝文征著《隋唐五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具体时间不详；以及《史前史》《商周史》《史学方法》《西洋现代史》《考古学》《隋唐五代史》《西北边疆史》等自编教材，作为国立西北大学1941年度各院系所用课本广泛印行；另外，沈志远著《新经济学大纲》，1934年北平经济学社出版；罗章龙著《中国国民经济史》，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尹文敬著《财政学》，1935年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胡寄窗著《战时物价管理政策》，1942年西安经济学报社出版发行；彭迪先著《战时的日本经济》，1938年生活书店出版；彭迪先著《实用经济学大纲》，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彭迪先著《新货币学讲话》，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李建勋、许椿生著《战时与战后教育》，1942年陕西城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示范研究所印；黎锦熙著《方志今议》（又名《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1939年商务印书馆印行；黎锦熙著《西北联大校史》，1944年5月陕西城固编印，等等。

西北联大学人的这些著作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20世纪三四十

<sup>①</sup> 参见梁严冰：《西北联大与西北历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年代中国学术“转向”西北的重要标志，以致对西北问题的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门“显学”。<sup>①</sup> 这些成果与著作，包括后来闻名世界的敦煌学及对古丝绸之路的研究、探索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端的。总之，西北联大学人的著述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 七 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宗旨与任务决定了中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因此，较为系统的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之一。1938年，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编译处，集中翻译马克思主义系列著作。1940年，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强调：“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sup>②</sup> 并要求“每一较大的根据地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sup>③</sup> 同年10月，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给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指出：“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的任务，就是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作品。”并特别强调了马恩列斯经典作家的著作出版。<sup>④</sup> 同年12月，毛泽东再次强调：“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sup>⑤</sup>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要求：“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sup>⑥</sup> 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出版马恩列斯的原著。

在党中央对著述出版的高度重视下，延安时期中央军委编译处集中主要力量翻译出10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20卷《列宁选集》。除此之外，延安解放社等还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德国农民战争》《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评》《共产党宣言》《马恩通信选集》《英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学论丛》《社会主义入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论中国》等，以及列宁、斯大林著作《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论国家》《论民族问题》《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社会主义与战争》《战略与策略》《“资本主义发展底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等数十种著作，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既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素养与水平，又丰富了陕甘宁边区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对指导广大青年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

① 参见梁严冰：《西北联大与西北历史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梁严冰、方光华：《抗日战争与中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10期。

② 《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册，第487页。

③ 《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9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年）》，第12册，第487页。

④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1940年10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年）》，第12册，第497页。

⑤ 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9页。

⑥ 《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1941年6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年）》，第13册，第136页。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著述活动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时期。同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也在这一时期发表出版了一系列著作，深刻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总之，毛泽东思想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发行，完整、全面地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策略方针和前途等问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如刘少奇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并强调：“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sup>①</sup>

## 结 语

从道光二十年（1840）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历了自古未有的急剧而频繁的变动，各种事物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一方面，规模不等、性质各异的战乱成为百余年间的历史背景，战乱造成的毁灭和悲壮横扫了一切既有的秩序，没有什么能够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动荡和冲突迫使国人不得不睁开眼睛，向外看世界，向内看传统，新旧中西之争由此冲击震撼着整个社会，没有什么能人够置身事外。在这风云际会的百年间，陕西再次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全国、全世界瞩目的焦点。鸦片战争的中心人物林则徐、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左宗棠都在陕西留下了自己的活动轨迹；晚清帝国的权力核心慈禧太后曾经将陕西变作行都和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辛亥革命中陕西在北方各省中率先响应武昌革命，摧毁了象征满清统治的西安满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陕西是最早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最终将陕北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新的出发点；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发展，由此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西北苏区改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新中国在这里奠基；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中，延安成为国人的信心和力量所在，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因此，1840—1949年的陕西著述内容丰富多彩。一言以概之，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陕西儿女们用著述形式记录与书写了时代赋予的灿烂篇章，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创了美好的新局面。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文化学术日益受到重视的新时代，树立文化自信，创造更加辉煌的文化，都必须站在历史的基石上。因此，系统了解近代陕西乡贤前辈的著述历史轨迹，挖掘其历史资源，总结其鲜明特征，传承他们的生存智慧和文化创造，探究近代陕西社会的变迁及其动因，对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文化自信，努力把陕西建成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必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曲江校区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sup>①</sup> 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335页。